

# 我在清华的“打工”经历

○周扬胜（1979级热能）

在清华五年，在1899名同级同学中，我太平常了：个子矮小、家境贫困、高考分低、学习不拔尖、无才无艺，当过最大的干部就是班级领导成员中无职无权的生活委员，这还是后期干部轮流当的结果，最高学术头衔也就是传热学课代表，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但是有别于大家的，可能是在母校的勤工俭学经历，就像现在大学生兼职“打工”，这是值得我特别怀念的事情。

## 为什么要“打工”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皖西地区的潜山县梅城公社河湾大队下坦生产队（现在改为梅城镇河湾村幸福组），就是那个我国第一篇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发生的、三国里大乔小乔出生的、黄梅戏发源的地方，人称皖国古都、黄梅之乡。我家就在两河之间的冲积畝区，也算是鱼米之乡，但是害怕发大水。1969年夏天，潜、皖两河洪水爆满导致决堤的情景令我记忆犹新：即将收割的水稻全被淹没烂掉，只得靠国家救济粮红薯度日，不堪回首。

上清华大学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不是我的“中国梦”。记得小学外墙上写有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赶清华”，所以我也知

道有个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

1979年的安徽农村仍十分贫穷，我家就更差，有五个孩子，我是老大，全家七口人主要靠继父挣工分过日子，妈妈不能完全出工，孩子多有很多家务，大妹被迫辍学在家干家务、带弟妹。一年下来，自然是“短款户”，年复一年，债台高筑。上大学时，通过亲戚的贺礼我得到四五十块钱，请裁缝做了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还有“的确凉”衬衣，棉袄是亲生父亲的遗物，穿的是一双带补丁的蓝色球鞋。

1979年秋天来北京上学，路费是从县教育局申请的，那个管事儿的干部一看我的通知书，二话没说就批给我20块钱。学



一号楼366室全体成员，左起：焦富兴、王敏、周扬胜、常安中、姜胜耀

## □ 母校纪事



热能系空调专业1979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第三排右2为作者

校给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农村同学发了冬装补助，我到五道口商场买了一套绒衣绒裤，既可以解决冬天御寒问题，又可以当作冬天锻炼穿的运动衣；在北院商店买了双黑色灯芯绒棉鞋，白塑料底，穿上很暖和；学校发给我甲等助学金，开始是19.5元，后来物价上涨，调到21.5元，助学金管生活基本还是够的。带来的钱花光了，第一个寒假我就没有回家，同班的胡运昆，因为家在昆明路途遥远，也没有回家。记得寒假期间饭票不够用，吃个半饱，饿得无精打采，又不好意思求人。第一学年（1980年）暑假也不知怎么搞到了回家路费，见到妈妈和家人，她说一年没有见到我，没有想到我长得白胖，和她在梦里见到我又黑又瘦完全不同，看来清华伙食不错，说我以后不必每个学期都回家。

尽管有助学金，伙食问题基本不大，

但没有零花钱，班集体外出活动也不能参加，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穷则思变，所以一直在琢磨“生财之道”。我在清华打工，和现在年轻人为了实习、锻炼、增加阅历根本不同，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减轻家庭负担，更好地轻装上阵投入到学习中。有人说人穷往往志短，但我是人穷志不短，打工挣钱乐在其中，有滋有味儿。那时候家庭困难的同学往往暑假不回家，挣点钱补贴小用或攒点寒假回家的路费。在学校的关心下，我班同学开展了多批次勤工俭学，例如，1980年寒假挖塘泥、1981年暑假我和范四川一起搬砖、1983年暑假我班几人搬木头、冬夜浇冰场、我和崔笑千等到清华三堡造林基地挖树坑（崔笑千说是国庆节）。当时，勤工俭学报酬标准为2.5元/人·天，还算可以，大学毕业生转正也只有54元/月吧。但学生们喜欢“包工”，想多劳多

得，想在单位时间内多挣点儿，要说大学生都不傻，但那时候还不时兴包工制呢，不像后来出现“包工头”这个职业，因此常与派活的校方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其实，校方希望给更多的同学都有机会参加勤工俭学，不仅仅是为了雇人干活完成任务。在打工经历中，挖塘泥、搬木头、浇冰场，是我牵的头，记忆深刻。

### 寒假挖塘泥

1981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老班长常安中同学聊起来，我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聊补“无米之炊”。老班长上大学前已经工作了十来年，比我们的社会经验丰富，我俩都住在1号楼366室，是上下床。他给我出主意，让我给校长办公室写一封信，请求校方给我们这些没有回家的同学安排点事情做，挣点儿钱，解决实际困难。信发出后，我以为没有什么希望，谁知看到系学生会通知，贴在一号楼大厅里，可以报名参加荷花池清淤劳动，就是挖塘泥。冬日里上午天气很好，心情也好，我和班里龚茂勤来到荷花池前，水已经放干，露出黑色池塘底泥。开工前，校学生会主席林炎志学长进行了“战前动员”，他讲了这次开展劳动的具体任务、缘由，也就是同学的期望和学校的目的、劳动中安全注意事项。他说，虽然有些同学来自农村，多年没有干体力活也不在行了，更不要说城里的同学。他强调，虽然按照土方量给工钱，如果出了事故他就扣工钱。这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我记住了他，也很关注他，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我们穿上胶靴、带上手套，用铁锹将半干半湿的塘泥

切成块儿，装上小推车，运到空地堆放。这个活我很在行，干得很卖力，效率也高，因为实行的是“土方计量工资”，希望多挣点，盘算着一天能挣多少。龚茂勤来自重庆市，是城里人，篮球打得好，干体力活一点也不在行，连架势都不像，和他一组我觉得有些吃亏。

那天有点累，手上感觉十分寒冷，但能干活挣钱，我的心里仍是美美的。莫名其妙地想起资本家真是好，他给我工作，我能挣他的钱，尽管他剥削我。结束时没有发钱，是事后发的，好像是20元。没有想到呀，这么多钱！当时大学老师每月才五六十元，“土方计量工资”实际是象征性的，同学之间一打听报酬基本相同，有点感觉是“半干半送”的，得到的报酬大大超过我们付出的劳动代价。一天20元，那么一个月应该是600元，怎么可能呢？恐怕这也是清华精神的组成部分吧？善待弱势群体，给你机会，给你自尊。

这次打工事件的背后决策我并不十分清楚，只能问问林炎志学长了，估计我那封请求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发现清华勤工俭学活动基本是由学生会组织。

### 暑假搬木头

1983年暑假，我们空9班从大连金州纺织厂结束“生产实习”回到北京。离开学时间也不多了，回家也没有什么价值，再说哪有钱买火车票？所以我就又在找“工作”，经过四处碰壁后，我来到位于出版社东边的学校基建处找到林泰处长，他热情接待我，询问一些情况后，就给学校木工厂打电话，要求那边给我派活。尽管工厂那边有些推辞，但他对对方说：

## □ 母校纪事

“就这么定了。”我到木工厂现场（新医院的位置）一看，是搬木头，小山儿一样一大堆，每根很大，我一个人根本扛不动，非要两人抬不可。回到一号楼，叫了几个没有回家估计有打工需求的同学，有范四川、付小勇、孙望勋，商量一起干。王厂长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将散落在地上的木头整齐码到另外的空地并按照每天2.5元支付报酬。开始时，我们勉强同意了，烈日当头，干着干着，大汗淋漓，热得实在受不了，我们要求改为包工制，经过反复和王厂长协商，他同意完工时结付给我们总的工钱。大概是这样计算的，通过皮尺测量木头有多少立方米，一人一天能搬多少立方米，换算成多少人天（其实是有水分的）。按照包工制干活，我们灵活机动，早上早到，中午可以休息，傍晚可以延长时间；干活时我们不穿上衣，肩上搭个毛巾垫着，两人抬一根。后来木头码得越来越高，难度增大，只能用麻绳将木头拽上去，一人在上面拉，一人在底下推，要说也很危险，万一木头滚下来，砸着人是要伤筋断骨的。经过几天的艰苦劳动、大战三夏，总算把木头在新的地方重新码好了。

谁知领工钱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王厂长讲了很多理由要少支付工钱，他起码是有一种心理：我们挣得太多了，厂里吃亏了。我们争吵起来，他在我面前，伸手点着我鼻子和我们争辩，我年轻好激动，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手指头，然后使劲一推，他叫唤起来倒退几步，左手握住右手，做痛苦状。当天双方不欢而散，工钱自然是没有领到。我们回到宿舍商量对策，觉得还是要去找基建处林

泰处长评理。第二天，林泰处长听了我们申诉，打电话了解情况，王厂长说我们动手打人，我们又解释一通，说王厂长不按照承诺支付工钱并“指点”我们。估计林处长听明白了，林处长说动手是不对的，说工钱会付的，要我们到王厂长那里做检讨，他让一胖乎乎的副处长带我们再去木工厂。显然，那个副处长和王厂长很熟悉，王厂长对他毕恭毕敬，又是递烟又是倒茶，加上我对王厂长说了些好话，范四川帮忙解围，请老同志多多包涵，不一会儿，王厂长对女会计交代几句话后走了。工钱算是领到，但被扣下不少，范四川说扣了一半。

### 冬夜浇冰场

冬夜里给冰场浇水是老班长常安中帮我找的活儿，他认识人多又十分关心我。那年冬天，天气很冷。溜冰场开放一整天后，冰的表面会出现很多沟痕，很不平整，这会影响到溜冰场第二天的使用。需要浇水的冰场是水木清华的水塘。下晚自习后，大约21:00，我走到西体育馆的体育教研组，领来手推车，上面装个水罐，上部有口可以加水，下部接一个黑皮管儿。我将装满水的推车顺坡推进池塘冰面上，将水管儿打开往冰面浇水，隔几分钟换个地方。大约要干四十分钟到一小时，回到宿舍快到熄灯点了。因为晚上太冷了，我的衣服也不厚，没干几天我就打退堂鼓了。

现在清华助学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我估计，我们当时勤工俭学活动对后来助学体系的完善应当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2014年2月28日于北京

（转自《1979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